



西方专家

为中国经济

张敏杰 主编
长春出版社

诊断



西方专家 为中国经济诊断

张敏杰 主编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专家为中国经济诊断/张敏杰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9.9

ISBN 7-80604-904-5

I. 西... II. 张... III. 经济-问题-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779 号

责任编辑: 张云峰 张耀民 封面设计: 朱 循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

四平恒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63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 000 册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张敏杰 1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与改革的研究述评

约兰德·洛门 / 普拉蒙·汤切夫 38

中国面临的挑战

东亚地区的主要特征——东亚奇迹的不同模式：日本模式、雁行模式及其他增长模式——近距离观察战后的中国——中国面临的挑战：地区差距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失业率上升问题、不完善的财政改革问题、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问题——中国能成为亚太地区的救星吗？——人民币问题——中国的出口动力——中国在抑制金融危机中的角色——结论

哈里·哈丁

72

影响改革的六大难题

中国在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中的发展前景——中国
与应该回归地区的关系——对美国的含义——改革的前
景——迄今的改革成果与问题——会出现的六类问题
——改革的三种前景——结束语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10

中国的第二步改革战略

科学知识在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中国的成就在世界低收入国家中是最成功的——东
亚奇迹与金融危机——改革问题——提高税收收入——
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住房改革——金融体制改
革——国有企业改革——国家资产负债——宏观经济对
微观经济改革的支持——参与及表达——走向国际舞
台：国际公共产品——结束语

爱德华·弗里尔

139

中国新型的农村组织

中国改革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成功——改革前的
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区的能人——新农村精英的出

现——农村的民主制度和村民委员会——农村共同合作社——村、乡、镇的经济委员会——股份合作体制——“戴红帽子”的经营者——农业部门仍然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

埃兹拉·沃格尔 153

社会转型中的问题

从细胞型社会到商品社会——雇用形式与生活方式——农民进城做工和基层权威的削弱——“关系学”与不完善的动态市场——腐化：“看门人”和缺乏耐心的消费者——对未来指导方针的建议

大卫·高德曼 186

中国的新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与社会变革——改革中的山西——私营业主——公有企业的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新中产阶级的各种特点

艾伦·刘 213

“温州模式”的利弊

“模式”的意义——温州及其人民——温州成功的

秘诀：“三M”（群众创造性、流动性和市场）与“—I”（空隙）的结合——发展的政治背景——发展的后果与问题——温州与中国现代化——温州的复兴和发展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道格拉斯·格里

230

关系的影响正在下降

关系：随着改革时期的制度变迁而变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关系及关系学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规范——《中国的社会关系学》一书提出的观点分析——中国城市工业中的关系和关系学——经济转型中与城市工业经济相关的关系体系的变迁——关系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构建中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加强——关系学与用人决策——市场及生意上的联系及网络——结论

多罗西·索林格

256

流动人口的就业渠道

引言——流动人口的特征——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特色：竞争、无序、无法——流动人口从事的六大行业——总结：劳动力市场逐渐走向多元化

阿兹朱尔·卡恩 / 卡尔·里斯金

285

中国的收入及不平等

1988 年和 1995 年的家庭收入调查——收入的定义及其构成——城乡收入及其构成：收入水平及变化——与官方估计数的比较——城乡收入不平等及其来源——中国整体不平等程度及其来源——城乡间的不平等——省际不平等——结论：公共政策需要考虑它们在分配上的后果

夏洛蒂·伊克尔丝

313

改革时期的代际契约

代际契约：代际之间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代际契约中的利害关系大为加深——改革：老人所面临的困难——调查方法与研究特点——个案介绍与分析——家庭赡养的未来——经济改革将如何影响家庭赡养的有效性及赡养者的意愿——总结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与改革的研究述评

张敏杰

自 19 世纪中叶中国加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便成为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主线。但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历经曲折，屡屡遇挫；无数仁人志士和炎黄子孙面对山河破碎、外辱内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了救国图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建国以来，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探索，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逐步找到了中国发展的方位和目标，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才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和焕然一新的格局。现在，中国以其持续的发展、辉煌的成就和巨大的潜力鼎立于世界。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这也就是说，中国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具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对旧体制作根本性变革的性质。这场改革不仅反映了领导人的改革意识，而且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发动，体现了千百万干部和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如果说，改革必须要有新的政

策、新的作为，才能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那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对实行了 20 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是新举措、新作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就是对实行了 40 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是新举措、新作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市场经济无疑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强大推动力量。

如同市场经济不仅使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一样，实行市场经济在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新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1979 年至 199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由 3600 亿元增至 74700 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7 位；1998 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仍达到了 7.8% 的年增长率，世界银行专家评价说，“中国人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绩。”但是，也有众多的国际文献认为，中国持续 20 年改革的动力现在已经减弱，宏观经济效益偏低，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和活力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而且还出现下降趋势；失业、收入分配不公、通货紧缩、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渐突出；随着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的关联日益密切，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显化，投资风险增大。

在社会领域，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保持整体稳定和发展的态势，但社会变动和某些特殊社会解组现象的出现，如人口流动加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打破、中产阶级阶层的崛起，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方式随之出现了失范的情况，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明显增多，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也在增多。在社会关系方面，人际关系中的功利关系日益严重，人口、婚姻家庭、就业、贫困、环境污染、交通等问题错综复杂，社会

消极因素增多。

在政治领域，20年来政治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将工作中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民主和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空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但也有些西方专家指出，中国存在地方分利集团的自我保护及对中央控制采取消极态度的问题，而目前几乎所有的利益调整都是在不触及政府职能的前提下进行的，政府职能的调整只保持了对利益调整的滞后反应；同时，中国的法制建设仍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不断暴露的官员腐败以及奢侈浪费、失职、渎职问题正在动摇公民的信任感、忠诚感和责任感，瓦解着社会公正的基础，对社会心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在思想领域，目前中国正经历着痛苦的文化嬗变和价值冲突，一方面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使人民群众的思想更加开放、活跃与多元，但国外的价值观念、文化思想及其示范效应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却使一部分人产生了信仰动摇和信仰危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民族传统因处在修复过程中而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同时社会道德系统控制功能的弱化，加剧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价值体系紊乱和价值冲突问题，使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毒瘤正在社会的肌体上潜滋扩大。

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阻力。当然，中国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无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同其他后发国家相比，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并具有一些明显的中国特征。因此，引起了世界众多学者对此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按照现代化分“三步

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通过改革而进入了以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基本内容的高速发展的轨道，这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思路的一次全方位的调整，它将经济发展与体制创新结合起来、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汇入到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去。这是一场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的革命。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的关注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

在此编者前言中，我首先将对 20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各种代表性研究作历史性的评述；然后，我要对当前海外的当代中国研究情况及本书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可以认为，这些西方学者，特别是本书论文的作者们都是学力资深、较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友好和真诚的。他们对中国所作的研究，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或向有关国家、有关国际组织提供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与评估。在研究中，他们对改革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存在问题和前进中面临的困难，有所揭示，并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虽然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文化教育背景、政治观点、思维方法以及遣词用语等方面与我們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的某些观点也不能完全为我们所接受，但其中不乏深刻、尖锐之处，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和借鉴。更何况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和推动力，已失去了原来“姓资”还是“姓社”的政治含义。

韦伯的中国研究及“韦伯命题”

在西方学者中，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论述得最早、最多也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

的《儒教与道教》发表于1915年，被认为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研究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五种社会因素，即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世袭制、宗法组织与法律，并从中发现了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如中国人有着强烈的营利欲以及对财富享乐主义的态度等。然而，为什么有了这些有利因素，中国人不但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且缺乏内在的对自己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趣呢？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儒教与道教》等书中，阐述了十分有名的“韦伯命题”，即对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产生之关系的认知。“韦伯命题”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基本框架：韦伯通过论证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了“只有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个基本思想，强调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扩张得益于新教伦理的西方文明之基本价值。由这种新教伦理体现的“资本主义精神”认为，一个人必须勤奋工作，因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③这是回应上帝“召唤”的神圣“天职”，如此才可证明上帝的“恩宠”，从而应具有自律、禁欲要求，并表现出一种理性的精神，勤、俭、诚实、有信用等品质视为崇高的美德和致富的手段。此外，他又通过对中国、印度以及古犹太民族的宗教研究，探讨和比较了中国的传统货币系统、城市与行会、世袭情况、宗教组织和法律，进一步说明东方国家基于古老落后的文化，无法为个人进取和制度创新提供动力。据此推论，非西方不发达社会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中存在阻碍经济发展的内容，即缺乏基督教新教伦理得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量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

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一直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不仅存在于古代，也存在于中世纪。可以说，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欲望。因此，对财富的贪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只不过是將这种欲望和动机变成了行动方式而已。

韦伯从中国的宗教入手，对儒教、道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试图揭示其间的奥秘。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未发生现代化的社会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儒教所倡行的伦理中缺少一种为谋得来世的灵魂拯救而禁欲的清教主义。他认为儒教的伦理教谕对中国现代化发生着阻碍作用并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1）儒教伦理的生活准则是无条件地肯定现世和适应现世，如“知足、安乐”，“知足者常乐”等等，这使人们安于现状，而不能促使人们产生勤勉劳动的动机；（2）儒教中缺少自然法和名义法的伦理成份，缺少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及基础；（3）儒教伦理排斥经济性情和专家精神，阻碍近代合理体制的产生；（4）儒教伦理支配下的宗族共同体严重阻碍着合理经营体（近代企业）的产生，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总之，韦伯力图证明在缺乏一种精神动力的情况下，即使社会具有一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也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理性的经济行为，他把中国未能产生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教伦理。

然而，韦伯并非孤立地讨论儒教文化对中国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从而得出中国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结论；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并不仅局限于宗教方面，而是广泛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广泛论及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的性质，并且做了深入的分析。

在经济方面，韦伯认为在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格局中农业生

产重于一切，而标志着现代经济理性化的至关重要的货币制度却十分混乱，加之农村对国家土地干预的抵制，使合理的农业企业无法产生，而且中国社会也缺乏现代工业萌芽的基础，理性的工业组织无法产生，小手工业也摆脱不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性质。

在政治方面，韦伯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是以政治而非经济因素为转移的，国家对社会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韦伯把中国归结为家产制国家，皇帝拥有绝对集权统治，官吏作为其家臣领取薪俸，管理的性质是伦理取向的、家长式的。所以在中国尽管可以存在一种“政治资本主义”，依赖于市场的商业资本主义也有一定发展，“然而，在家产制政体下，标志着现代发展的特点的理性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则无立足之地。因为投资于工商业‘企业’的资本，对于这种非理性的统治形式过于敏感，此外，它过于依赖这样的可能性，即：国家机器能否像某种机器那样平稳而有理性地运作，并且可以估量。换言之，在中国式的管辖下，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④

在法律方面，韦伯认为中国缺乏理性的司法，也缺乏自然法的观念和形式法的逻辑，因而“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学基础。在中国的经济里，未出现理性的客观化倾向”^⑤。

在社会方面，韦伯认为宗族这种在西方中世纪就已完全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的组织在中国则完全被保存了下来，“这一传统主义的势力，无论就其整体性来说，还是就其持续的时间而言，均胜过官僚体制，因为它卓有成效，并经常受到最紧密的私人团体的支持。再者，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引起恶意的猜度，尤其是财政上的改革最受怀疑并遭到激烈的抵抗。”“氏族团结一致的抵抗，自然比西方自发形成的工会所发动的罢工，还要来得有威力。因此之故，现代大企业所独具的劳动纪律与自由市场的劳工淘汰，

以及任何西方式的理性管理，在中国便受到阻碍。”^⑥

虽然所谓“韦伯命题”并不是韦伯提出来的，而是当代西方理论家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对韦伯思想观点进行解释的结果，但是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以及大批东方学者大多接受了马克斯·韦伯的这一观点，对东方的传统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并认为东方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其实质是认为后发国家传统势力强大，社会内部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输入，把西方早发式现代化模式作为仿效甚至全盘接受的样板，才能实现现代化。

无论人们对“韦伯命题”如何理解，但都应当承认韦伯提出的研究视角，启示了学术界的研究方式，使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确认综合考察整体社会的系统方法，并对非经济因素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上升到了理性的认识高度。^⑦同时，尽管认为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式现代化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其中关于吸纳早发国家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经验，则是合理的思想。

中国现代化的阻力与发展之路

马里恩·列维（Marion J. Levy）试图从传统的中国家庭制度中寻找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列维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家庭制度不利于社会的变化。他把中国和日本的家庭作了三方面的比较，找出了其间的差异：（1）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在日本，家庭的确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它却是依附于其他社会因素之下的，社会乃产生不同的规范制约家庭，或使家庭为社会服务；而在中国，利用家庭为社会服务的可能性相当有限，因为中国的家庭结构远比日本要强。（2）阶级制度不同。中国的阶级体系几乎是完全开放的，而日本的阶级体系则是完全

封闭的，由此导致中国商人的声望势力十分低下，但开放的阶级体系允许商人的子女经过考试等正式途径或捐官、贿赂等非正式途径进入官僚阶层。日本的阶级体系中，任何由下向上的流动都被抑制，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与其父母原有的社会地位相同，于是日本商人对于进入官僚阶层不抱任何希望，只是兢兢业业地做买卖，从而导致日本经济的发展。(3) 继承制度不同。日本强调长子继承，从而使一代代的资本集中在一个家庭，既能有效地把资本运用于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上，又能鼓励有效力的商业行为；而中国则提倡平均继承，使资本趋于分散，不利于现代化。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则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归因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摩尔在其《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中的政治牵连。摩尔指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任何事物都与政治相联系，受政治影响。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牵连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一些官僚体系中地位最低的、处在政府官员和普通人民之间的“官僚候选人”，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现代化上，而是为了争夺权力将精力浪费于无效的反抗和暴动上。(2) 封建集权时期的中国，从未出现过像西欧封建制度后期演变出来的中产阶级，因为中国人深信赚钱的活动对于学者、官员的威望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政府谨慎地不使所谓赚钱的活动脱离政府的控制。(3) 一方面，中国的贸易和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是外来的，政府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工业化的计划；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各种势力集团又企图利用现代化技术为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4) 在 19 世纪，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5) 采用企业化农业的失败表明，中国的地主阶级无意为供给城市而改进生产方法并增加生产。

可以看出，上述西方学者的议论基本上都是就中国社会发展